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文库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卷 四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首席专家、总编 张静如

本卷主编 张静如 孙秀民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文库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卷 四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首席专家、总编 张静如

本卷主编 张静如 孙秀民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 张静如, 孙秀民主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张静如主编)

ISBN 978-7-200-06770-5

I. 中… II. ①张… ②孙…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古代 IV. 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010 号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卷四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ZHONGGUO GUDAI ZHIGUO LIZHENG JINGYAN YANJIU

首席专家、总编 张静如

本卷主编 张静如 孙秀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6.375印张 256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200-06770-5

D·461 定价:300.00元(共5卷)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编委会

首席专家、总编 张静如

编委会主任 宋贵伦 张文启

编委会副主任 辛国安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树荫 刘道福 孙秀民

周淑真 姚 桓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杜淑华 卢颖华 许 星

林 杨 刘永华 赵海英

郎清平 景 红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编者

主 编 张静如 孙秀民

撰稿人 张静如 孙秀民 王保庆 赵朝峰

胡献忠

编者的话

我们的时代是不同寻常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树一帜；共产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独领风骚。然而，作为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更好地担负起13亿中国人民的历史重托？中国共产党庄严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吹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号角。这是清醒的判断，是历史性的承诺，更需要上下不懈地求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受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委托，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因而催生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试图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从理论层面探索其理论体系及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执政基础、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切入，重点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及其如何提升。

这套丛书，力图开阔视野，多角度进行分析，从古今中外四个维度，总结中国共产党自己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吸纳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和近现代世界政党执政兴衰成败的经验，以为我党提高执政能力提供参考借鉴。

这套丛书，注意贴近实际，直面现实，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这套丛书，追求朴实文风，不说空话、套话，努力用比较通

俗、平和的话语，分析问题、阐明道理、开启新风。

这套丛书，倡导开拓精神，启发读者思维，追求的不只是完成任务的成果形式，而更多的是渴望用自己的深思引起读者的共鸣与认同，抛砖引玉，撞击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火花。

这套丛书从2004年6月开题到2007年年初书稿付梓，历时两年半。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高度重视，首席专家张静如教授倾尽心血，各子课题的撰写者姚桓、刘道福、王树荫、张静如和孙秀民、周淑真等教授几易其稿，反复征求众多党史、党建学者的意见，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5本专著，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世界政党执政兴衰成败借鉴研究》。

任何真理，大都有自身的尺度。大约400多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说道：“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做一种意见，而是看做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每一位阅读本套丛书的读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是阶段性的成果，是研究的过程，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延伸的一个新起点。我们期望您对这个起点提出批评建议，更希望您走向新的、更大的成功。

2007年1月于北京

前 言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积淀了丰富的政治文明。从夏朝建立到清朝结束，传统政治延续达4000余年，其中有的王朝统治长达数百年以上。透析其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许多共同成果。对于这些成果，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予以批判与继承，这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何谓古代治国理政？可以简单界定为古代社会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集团）的政治统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国家和社会及民众实施管理的制度设施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它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和制度设施。这是古代治国理政的主体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保证。二是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虽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未取得统治地位，也没有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设施。从发展的角度看，这部分也是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部分不断被吸收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和制度设施。三是违背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和制度设施。这是古代治国理政的非主体部分，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力衰微、民不聊生的重要政治根源。

具体来说，古代治国理政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统治者要确立治国安民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皇帝统治的地域称为“天下”，诸侯统治的疆域称为“国”，大夫统治的疆域称为“家”，它们又同作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家族、家庭紧密相联，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统治者要正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把道德修养、持家、管理国家和社会统一起来，树立正己修身、民为邦本、勤政廉政、选贤任能、变法改革、御史纳谏、居安思危

的理念。

其次，优化国家的治理形式。在中国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儒家倡导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及以老庄哲学为指导的“无为之治”。如果说法治和德治代表了内外兼治，那么无为之治则是养中求治。法治利国、利君、利大治；无为之治利民、利休养；德治利国、利民、利长久之治。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治久安之道，是德治、法治、无为之治的辩证统一。

再次，建立健全治国安邦的制度设施。任何一种历史类型的国家，尽管阶级属性不同，都具有政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中国古代国家也不例外。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它们除了强化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以外，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履行国家的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居乐业；通过国家干预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确立官方意识形态，统一民众的思想，兴办教育，支持和引导私人办学；立足社会稳定，强化民众管理，开展救灾赈荒、社会救济，等等。当然，履行这些社会职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

最后，总结历史启示和教训。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不仅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提供了使后人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如，尽管强调法治，但“法自君出”，并没有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际是“人治”；正是“人治”的需要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特质，古代的统治者注重个人修身而轻视制度建设；尽管制定了纵横交错的权力制约制度，甚至包括对君主的各种约束，但权力监督的最高权柄却掌握在君主手中，其结果决定于君主个人。

综观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可以看出它有阶级性与公共性、实践性与理想性、动态性与相对稳定性等二重性特点。古代的治国理政是古代剥削阶级国家治国安邦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不仅为统治阶级（集团）的政治统治服务，具有阶级性，同时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用，具有公共性。如正己修身、民为邦本、勤政廉政、选贤任能、变法改革、居安思危等治国安民的理念，不仅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阶级（集团）要树立的执政理念，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国家的执政党所要确立的执政理念；古代的治国理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完善的理论体系，有的应用在具体的治国实践中，有的则没有治国的实践，仅是思想家的理论设想，有的在这个朝代应用在具体的

治国实践中，而在那个朝代则没有治国的实践，仅是思想家的理论设想；古代的治国理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保持核心内容基本稳定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官吏的选任、考核、俸禄、致仕等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而逐渐完善，并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形成了西方文官制度。

由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具有二重性的特点，特别是其公共性的特点，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优秀遗产，并用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料，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治国理政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共性与个性、对立与统一的基本原理，对历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和同一阶级之间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作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科学地借鉴。

对于执政党的建设来说，执政能力建设是最根本的建设之一。增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它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等。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长治久安”的治理形式	1
一、以德治国：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	1
(一) “敬德保民”	2
(二) “为政以德”	5
(三) 以德王天下	7
二、以法治国：法家治国的基本主张	14
(一) 法家对“法”的认识	14
(二) 法家的立法和司法原则	16
三、德主刑辅：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模式	19
(一) “德主刑辅”思想的历史传承	19
(二) “德主刑辅”方略的运作方式	33
第二章 治国安民的理念与行为	37
一、正己修身	37
(一) “正己修身”的重要价值	38
(二) “正己修身”的基本内容	43
(三) “正己修身”的基本方法	46
二、以民为本	48
(一) 殷周：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	48
(二) 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理论概括时期	50
(三) 汉唐：民本思想的系统完善和实际运作时期	52
(四) 宋元明清：民本思想的极致时期	55
三、勤政廉政	59
(一) 勤于政事，励精图治	60

(二) 廉洁从政, 蠹浊扬清	62
(三) 勤政廉政, 相辅相成	69
四、选贤任能	70
(一) 人才的价值	70
(二) 识才之法	73
(三) 选才标准	75
(四) 用才之道	80
(五) 育才之途	85
五、变法变革	88
(一) 变法变革的理论	88
(二) 变法变革的历程	91
六、居安思危	101
(一) “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101
(二)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102
(三) “安者非一日之安, 危者非一日而危”	103
(四) “鉴国之安危, 必取于亡国”	104
(五)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105
(六) “安不忘危, 治不忘乱”	107
(七)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108
(八) “于安思危, 于治思乱”	109
 第三章 治国安邦的国家制度	 112
一、国家职能	112
(一) 政治职能	112
(二) 经济职能	115
(三) 文化教育职能	119
(四) 公共管理职能	122
二、国家机构	126
(一) 国家机构设置和调整的原则	127
(二) 中央机构	129
(三) 地方机构	133
(四) 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机构	137
三、制约与监督	141
(一) 对君主的制约	141

(二) 对百官的监督和制约	147
四、吏治	149
(一) 选拔任用	149
(二) 回避	153
(三) 考核和奖惩	156
(四) 俸禄	158
(五) 退休	161
第四章 历史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165
一、重视“人治”，轻视“法治”	167
(一) “德治”与“法治”的实质都是“人治”	167
(二) “人治”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173
二、重视当政者的道德修养，轻视制度建设	177
(一) 君子——当政者道德修养的目标	178
(二) 吏治制度建设的基本情况	181
(三) 重修养轻制度的危害	185
三、权责失衡	187
(一) 君主享有一切权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188
(二) 机构重叠，官吏争权夺利，推诿责任	191
(三) 权责分离对于历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194
附 录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典著作评介	195
一、《老子》	195
二、《论语》	203
三、《韩非子》	215
四、《春秋繁露》	222
五、《贞观政要》	231
六、《资治通鉴》	238
后 记	247

第一章

“长治久安”的治理形式

中国文明社会绵延几千年，从西周“明德慎罚”的礼治，到秦朝“明法重刑”的法治，中华民族的早期政治家、思想家对治国安民之道已几经思考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种模式。前者认为道德至上，主张以教化为主，“以德服人”；后者认为法为至道，主张以“赏”、“罚”为二柄，“以力（暴力）服人”。两者各执一端，各有长短。在经过汉初“无为而治”的静思反省和经济复苏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终于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树起了“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大旗。西汉以来，无论是一统华夏的大帝国还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无论是农耕为本的汉族还是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历朝历代统治者都继承和坚持了这一治国方略，王霸并用，阳德阴法。尽管不同王朝根据各自统治时期的社会情形，对德治与法治各有侧重，但“德主刑辅”的基本格局则始终没有改变。

一、以德治国：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

“以德治国”也称“德治”，是古代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先秦儒家提出的治国理念，其基本内涵是突出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义来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治国安民，同时要求政治统治（包括经济、行政、教育等方面）都应符合伦理道德。这一治国理念的形成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敬德保民”

早在上古三代，以德治国思潮及其实践就胎动于神道主义的母体中。自夏王朝始，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就在不断探索维持“家天下”统治的有效方法。夏启与有扈氏开战之先，反复向“六卿”宣讲战斗的意义；汤伐夏桀，武王伐纣，首先揭露敌人的荒淫败德，以示自己行动的正当合理；盘庚迁殷前后，耐心训导庶民，讲解迁徙意义。在《尚书》的记载中，“德”字出现了224次，几乎篇篇都有，可见夏商周社会对“德”的重视。

何谓“德”呢？《尚书》中“德”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德”的第一项基本含义是保民、养民。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① 政治完善就是“德”，政治完善的标准在于让人民生活得很好。换言之，“德”需要治理好“六府三事”。由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成为三代有作为的统治者的信条。《尚书·盘庚下》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统治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微子也说：“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② 这就明确地把“德”与“功”联系起来。同样，《尚书·君陈》中也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此处的“德”也有为民造福之意。统治者为什么要反复地强调保民、养民呢？皋陶说得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③ 保民、养民就能够得民心，受民拥护，君民关系就会融洽，就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

“德”的第二项基本含义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个人才能、品性的主要标准。抛开君权神授的因素不说，尧舜禹都是以完美品德称王的。舜在赞扬禹的美德时说：“（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汝惟不伐……予懋乃德，嘉乃丕绩。”^④ 说禹勤俭、谦虚、不自伐，上天将会选他做君主。具有完美道德的人才可以做君主，而具有不同品德的人可以作任不同的职务，所以治国安民一定要用贤德之士。“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

① 《尚书·大禹谟》。

② 《尚书·微子之命》。

③ 《尚书·皋陶谟》。

④ 《尚书·大禹谟》。

惟其贤。”^①“德”是指贤良之才、操行高尚之人，而“恶德”指道德品行败坏之人，自然也就是不贤之人。古人还认为：“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②这既说明了用贤是“德”的内容，又说明了用贤的必要性。

商末周初，新兴的统治者认识到了民众在推翻旧势力中的巨大力量，看到了民意和天意的不同步，代表民意的周战胜了传统上认为代表天意的商，这就使得周朝统治者深刻反思商朝统治者的管理方式和失败教训。他们认为天意不是孤立的，天意和民意应该是统一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④。所以在周书里，天与民真正地联系了起来：“天棐忱辞，其考我民。”^⑤上天帮助、劝诫我们，就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人民。“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⑥上天由于可怜人民，才终止了商的福命。

既然天意和民意是统一的，顺应民意也就是顺应天意了，所以，在政治上合民意就能保天命。这样，统治的中心任务就不再仅是保天命，而更重要的是顺应民意了。因为天命渺茫难测，而民意才是容易把握的，圣王都是“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⑦。在这里可以看到，周的统治者与夏商统治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吧顺应民意看成顺应天意的主要途径，而不再把尊天命作为统治的最重要的着力点。

如何面对民意解决现实问题呢？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在《尚书·康诰》中阐述道：“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衿衿，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周文王缔造新王朝的原因，关键在于实行了一套崇尚德教而谨慎使用刑罚的政治措施：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并让民众了解了这些情况。周公把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德”。作为文王的后继者，要保住

① 《尚书·说命中》。

② 《尚书·罔命》。

③ 《尚书·泰誓上》。

④ 《尚书·泰誓中》。

⑤ 《尚书·大诰》。

⑥ 《尚书·召诰》。

⑦ 《左传·桓公六年》。

国家和天命，就要继续走文王开创的路，因此，周公一再强调：“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① 另一位政治家召公也认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② 所以，周初统治者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敬德”。

“敬德”首先要“明德”。“明德”，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自身要求和行为规范而言的，要求统治者不断注意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修己以用贤。“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③ 要行德政，必须是仁厚爱民之君，决不能耽于享乐，更不能腐化堕落。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更好地完善自我，推恩于民众。要“明德”，还要用可用之人，也就是用贤。“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④ 统治者不但要完善自己，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聚集一大批可用的贤能之人，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尽可能地纳入到统治阶层中。只有这样，国家的统治才能稳定长久。

“敬德”还要求统治阶层做到“保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⑤ 他们认为，民情能够体现天意。作为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若能俯顺舆情，体察民心，制定的政策方针就能合时宜，上苍就会给予帮助；否则，天之不助，必亡无疑。上天的旨意已经含在民意中了，只辅佑行德政、得民心的君主。周公还把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结为上天对不行“敬德”或“敬德”未善的惩戒，认为如果社会中小民捣乱，不听教导，国家没有治理好，都是上天的惩罚。“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⑥

后世把周初的这种统治理念称之为“敬德保民”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天才不会断绝天子大命，并使他永远保持大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⑦ 上天不会赐大命给不努

① 《尚书·君奭》。

② 《尚书·召诰》。

③ 《尚书·无逸》。

④ 《尚书·旅獒》。

⑤ 《尚书·康诰》。

⑥ 《尚书·康诰》。

⑦ 《尚书·召诰》。

力施行德政的人，凡是国家的丧亡，没有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惩罚的，“惟天不弔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①。而且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了“保民”的效果，就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拥护。可见“敬德”也就是敬天，又因为“德”与“民”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也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这叫“以德配天”；反之，不敬德，失民心，就会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②同时，周代统治者对“敬德保民”的认识过程也是不断深化的，从泛泛的“敬德”提升到“疾敬德”：“王先服殷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③

（二）“为政以德”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④，思想界空前活跃，形成了犹如小山乍裂、波洪起涌般的“百家争鸣”思潮。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明确提出了“德政”理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就是说，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待在自己固定的位置，四周由众多星星环绕着。

同周代政治家的思路一样，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主要也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的：一是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二是管理庶民百姓的方式。这两个问题是对殷周以来德治思想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前者是“修己”问题，后者是“治人”问题。修己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它要求统治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行；治人是对广大庶民百姓而言的，是对民众的管理和教化问题。对于广大民众首先要满足其生存需要，解决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道德修养。两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强调把统治者的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

在孔子的德治模式中，道德具有超越一切的无形力量。为政者具有了这一道德禀赋，便拥有了政治人格和权力权威，也就拥有了为政治国、安人安

① 《尚书·多士》。

② 《尚书·蔡仲之命》。

③ 《尚书·召诰》。

④ 《荀子·解蔽》。

⑤ 《论语·为政》。